

中國社會學家對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的理解與分歧¹

謝立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圍繞著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性質和方向等問題，中國社會學家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發生在所謂的“廣義轉型論”和“狹義轉型論”之間。這種分歧不僅影響到社會學家對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解釋，而且也影響到普通公眾和政府決策者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和行爲。本文作者對這一分歧中最主要的部分內容進行了簡要的介紹、分析和評論。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社會的結構和形態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是，如何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一社會轉型？這一轉型的性質是什麼？它的最終方向會是什麼？這是觀察和思考這一轉型過程的人們必然會提出的問題。

近些年來，圍繞著這些問題，中國社會學家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發生在所謂的“廣義轉型論”和“狹義轉型論”之間。這種分歧不僅影響到社會學家對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解釋，而且也影響到普通公眾和政府決策者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和行爲。在本文中，我將對這一分歧中最主要的部分內容進行簡要的介紹、分析和評論。



一 “打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 “市場轉型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轉型過程的研究

在近年的中國社會學界，最有影響的一種有關社會轉型的理論可以說是所謂“市場轉型理論”。“市場轉型理論”是由塞勒尼(Ivan Szelenyi)、伊亞爾(Gil Eyal)、倪志偉(Victor Nee)、斯達克(David Stark)、邊燕傑(Yanjie Bian)等美國社會學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倡導和發展起來的一種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為專門研究對象的社會學研究取向。由於這一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塞勒尼是匈牙利人，其研究也是以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l)的理論為起點，故認同這一研究取向的學者也常被稱為“布達佩斯學派”。

如上所述，“市場轉型理論”的研究主題是20世紀70–80年代開始在蘇聯、東中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裏發生並一直延續至今的這場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目標的社會轉型過程。塞勒尼等人把波蘭尼(Karl Polany)在《大轉型》一書中討論的歐洲國家在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曾經經歷的市場轉型過程稱為“第一次大轉型”，而將他們所討論的這場市場轉型過程稱為“第二次大轉型”。塞勒尼等人認為，與波蘭尼研究的“第一次大轉型”相比，他們正在研究的這場“大轉型”至少有以下一些特點：

1. 第一次“市場轉型”涉及的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的轉型過程，第二次“市場轉型”則涉及的是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的轉型過程；這就使得兩者無論在歷史起點、前提條件上，還是在發展邏輯上，都會有各自的特點。

2. 在第一次市場轉型進程中，推動資本主義市場社會興起和發展的社會力量主要是工業資產階級，而在第二次市場轉型進



程中，由於資產階級早已經被先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因此推動資本主義市場社會興起和發展的社會力量將是工業資產階級以外的其他一些力量，如掌握了“文化資本”的文化精英等。人們將面臨一種“沒有資本家來建構的資本主義”這一情境。

3. 在第一次市場轉型中，之前的封建社會並沒有徹底摧毀一切自主性的社會團體，在封建社會中孕育起來的諸多社會團體（行會、教會、其他結社等）後來成爲“市民社會”形成的重要基礎；但在第二次市場轉型中，之前的社會主義社會徹底摧毀了各種自主性的社會團體，這就使得在之後的市場轉型進程中，“市民社會”的形成困難重重。

4. 在第一次市場轉型中，市場機制的引入首先引發的社會效應是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拉大；相反，在第二次市場轉型中，市場機制的引入首先的引發的社會效應則是社會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當然，對於這一點，在“市場轉型”理論家們當中後來引起了爭論。參見邊燕傑等人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一書中的討論）。

當然，除了上述這樣一些共同點外，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正在發生的“大轉型”各自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徵。例如，按照塞勒尼等人的說法，在中國和越南，這場市場大轉型是由普通民眾由下而上自發地推動起來的，“市場轉型理論”家們將在中國和越南發生的這種轉型類型稱爲“自下而上的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這場市場大轉型是由政府部門自上而下地推動起來的，“市場轉型理論”家們將這種轉型類型稱爲“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在中歐國家，這場市場大轉型則是由外國資本推動起來的，“市場轉型理論”家們將這種轉型類型稱爲“外資建立的資本主義”。這三種不同市場轉型類型的一些更爲具體的特點可見下表：



後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不同類型²

	自下而上的 資本主義	自上而下的 資本主義	來自外部的 資本主義
財產關係	自發產生的私有財產與公共財產並存	前黨政精英及委託人發起的私有化	跨國公司發動的國有企業私有化
市場制度	市場+國家再分配	市場+關係網絡	市場+某些網路
權威的性質， 或資本主義 的類型	混合的承襲制+ 理性支配的混合 =國家資本主義	新承襲制支配 =政治資本主義	理性支配=自由 主義和全球化資 本主義

塞勒尼等人認為，兩次“大轉型”都將對社會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從對第一次市場轉型過程的考察中產生了以馬克思、塗爾幹、韋伯、齊美爾等為代表的“古典社會學”。而對第二次市場轉型的考察將導致一種可以稱為“新古典社會學 (Neo-classical Sociology)”的研究領域產生。塞勒尼等人明確地寫道：“共產主義的瓦解可以被理解成發給社會學家的請柬，邀請他們重訪那些曾經被諸如馬克思和韋伯這樣的古典社會學家所探討過的舊研究基點。正如新古典經濟學隨著福利國家的衰落而興起一樣，共產主義的垮臺為啟動新的研究項目提供了機會，亦即為新古典社會學設定了研究議程”。³ 塞勒尼等人對發生在前蘇聯、東中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裏的所謂“第二次大轉型”的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信念的激勵下展開的。

二 “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 “市場轉型理論”在中國的引進和發展

自20世紀末期起，孫立平等人開始將“市場轉型理論”介紹到中國。最主要的介紹文章是孫立平撰寫的“從‘市場轉型



理論’到關於不平等的制度主義理論”(1995)⁴，“社會主義研究中的範式及其轉變”(1997)⁵，“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2005)⁶等。

進入21世紀以來，“市場轉型理論”的部分代表性作品開始逐漸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主要包括：邊燕傑主編的《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一書⁷，伊亞爾、塞勒尼、湯斯利合著的《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鬥爭》一書⁸，塞勒尼等人的論文選集《新古典社會學想像力》⁹，等。

孫立平不僅致力於將“市場轉型理論”引進中國，而且也致力於在中國的情境下進一步推進該理論的發展。孫立平推進“市場轉型理論”的主要思路集中表述在“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和“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這兩篇文章中。

在“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一文中，孫立平首先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科學界“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研究”領域中興起的“布達佩斯學派”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孫立平指出，布達佩斯學派對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市場轉型的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無論是對於市場轉型的研究，還是對於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研究，布達佩斯學派所關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組織和制度等結構性特徵。

第二，對於結構性特徵的關注，主要是通過大規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的。特別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歐精英轉換的研究。

第三，基本的理論視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對精英問題的重視，突出表現出這一視角的特徵。

第四，作為上述三點前提和基礎的，是布達佩斯學派所研究的市場轉型國家，主要是東歐，特別是中歐的匈牙利，在這些社會中，市場轉型伴隨著政體的斷裂。”¹⁰



孫立平認為，這幾點當中，最後一點是最為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前提。因為布達佩斯學派的主要理論取向、研究視角和所使用的方法，都與此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蘇東的市場轉型是與政體的斷裂連在一起的，這意味著在大規模的市場轉型發生之前，政體和主導性的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樣就為名正言順的、大規模的、以國家立法形式進行的市場轉型提供了可能性。在這種轉型過程中，在很短的時間內，社會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達佩斯學派有理由將他們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結構的特徵上，放在不同時期正式制度結構的比較上。”¹¹

同樣，由於在這樣的市場轉型過程中，原來的權力精英由於政體的斷裂而失去了原有的資源，而新的經濟精英還沒有發育起來，這就為知識精英提供了舞臺，使得知識精英在整個轉型過程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就使我們可以理解在布達佩斯學派中“為什麼對上層精英給予非常高的重視，並使用了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視角。”此外，我們也可以理解布達佩斯學派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因為“對於研究大規模的正式制度的變遷來說，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的方式，也無疑是有優勢的。”

然而，孫立平認為，中國的市場轉型過程與前蘇東歐國家卻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種不同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的市場轉型是一種“政體連續性背景下的漸進式改革”，即“在基本社會體制（特別是政治制度）和主導性意識形態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這是中國社會轉型一個最基本的特徵。

第二，與此相聯繫，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精英轉換也與前蘇聯東歐國家有著明顯差別。由於政體的連續性，原有政治精英的強勢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結果是導致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精英的形成，不是一個不同類型精英的轉換過程，而是原有的政治



精英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不斷向新的社會領域擴張，使自己轉變成為一個集“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於一身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

第三，中國的市場轉型主要是在主導性意識形態連續性背景下通過各種“非正式運作”的方式來進行的。“政體斷裂背景下的市場轉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過正式制度推進的方式進行的。”“這種轉型過程，為正式制度發揮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而中國的轉型過程幾乎伴隨著不間斷的意識形態爭論，這就迫使改革者採取兩種應對策略，“一是將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場因素納入原有的意識形態當中，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等；另一種方式，則是‘不爭論’。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說。而實質性的改革措施，有許多是通過變通的方式進行的。”¹²

孫立平認為，概括起來，與前蘇聯東歐國家相比，中國的市場轉型至少具有以下這樣一些獨特性：

“第一，政體和意識形態是連續性的，在改革進行了20多年後的今天，居於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來的政體和意識形態；

第二，由於政體和意識形態是連續的，許多重要的改革和轉型過程是使用變通的方式實現的；

第三，在變通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開始的階段，新的體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現並傳播的；

第四，非正式體制的生長和發育，往往是發生在體制運作的過程當中。”¹³

根據上述分析，孫立平認為，這表明布達佩斯學派的那一套理論和研究方法難以簡單地被運用來研究中國當前的社會轉型過程，表明我們在研究中國市場轉型的時候，不能像布達佩斯學派那樣，把注意力主要集中於正式的結構和制度層面上，而必須對各種非正式因素給予足夠的關注，要進入到市場轉型過程的“實



踐層面”，用對市場轉型過程的“實踐分析”來取代布達佩斯學派的“結構—制度分析”，對市場轉型過程的實際運作進行深入透徹的分析。

孫立平指出，從“實踐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社會轉型，就需要認真研究和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為市場轉型的實踐邏輯往往是在那裏產生的，也往往是在那裏體現出來。

孫立平關於“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的呼籲在中國社會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有不少人試圖運用“實踐社會學”的方法，來對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進行探討。限於篇幅和本文的主題，我們在這裏略去對這些文獻的介紹。

三 對“市場轉型理論”的批評：從“廣義轉型論”的立場出發

孫立平等人倡導的“市場轉型理論”及其中國化思路在中國學者中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也很快受到了其他一些中國社會學家的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批評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鄭杭生教授。2007年左右，鄭杭生教授等人撰寫了一批論文，對孫立平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爲了更好地表明自己的理論立場，也爲了更好地批評孫立平的觀點，鄭杭生區分了所謂“狹義轉型論”和“廣義轉型論”兩種不同的轉型理論。所謂“狹義轉型論”，主要指塞勒尼和孫立平等人所倡導的那種關於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理論，即“市場轉型理論”；所謂“廣義轉型論”則主要指鄭杭生教授等人自己倡導的一種關於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理論。

這兩種轉型理論的共同點是：第一，都主要是以中國當前的改革與開放過程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第二，都使用“社會轉型



(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詞來描述當前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變遷等。

這兩種轉型理論的不同點則在於：“狹義轉型論”傾向於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理解為是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的轉變；而“廣義轉型論”則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理解為是“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即社會實踐結構不斷從傳統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的轉型變遷過程，也是社會主義體制的成長和完善的過程”。¹⁴

鄭杭生教授明確寫到：“近年來，新布達佩斯學派的狹義轉型論在中國再度升溫，凸顯了中國社會轉型問題上特別是‘向度’問題上的重大分野：社會轉型是像廣義轉型論所主張的，是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即社會實踐結構不斷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這一過程將成就中國的新型社會主義的豪邁實踐，還是像布達佩斯學派狹義轉型論所主張的，社會轉型是蘇東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東歐、蘇聯以及中國、越南等）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中國社會轉型是‘自下而上’的由現代社會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過渡。這一點導致了廣義轉型論和狹義轉型論在一系列理論問題上的分歧。”¹⁵

鄭杭生認為“狹義轉型論”有以下幾方面的缺陷：

1. 將“社會轉型”僅僅理解為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遷（“第一次轉型”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第二次轉型”則是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因而對“社會轉型”的解釋無論在歷史過程、地緣空間、社會制度、研究取向、描述分析等方面，都顯露出明顯的狹隘性和封閉性；

2. 將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變革一概理解為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的轉變，似乎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與發生在前蘇聯、東歐國家中的社會轉型過程一樣，是一種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成員”的過程，因而對當前中國的



社會轉型過程做出了錯誤和歪曲的解釋。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一些特點如漸進式改革、體制轉軌、市場化、國有企業改制、勞資關係、階級結構、精英形成等都被看成是資本主義新類型的佐證。

3. 由於將“社會轉型”狹隘地理解為從某種非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因此對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思、塗爾幹、韋伯等）的理論也做出了錯誤的解讀，認為古典社會學的主題僅限於討論“資本主義文明是怎樣產生的”這樣一個問題。而其實古典社會學的議題比這要廣泛得多。

4. 由於將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理解為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但又不能很好地解釋當前中國社會在基本制度、精英結構、意識形態等方面與之前“社會主義社會”具有高度連續性這一事實，因此只能通過對“結構—制度分析”方法的否定、對以“實踐邏輯”的探討為內容的“實踐社會學”的強調來為自己的論點尋找方法論依據。

鄭杭生認為，他所宣導的“廣義轉型論”在理解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持以下看法：

1. 所謂“社會轉型”是一個從傳統向現代、從現代向更加現代的社會轉變的過程。

2. 在這一過程中，各國社會轉型的“向度”有著多維多樣的選擇，並不是只能向“資本主義”轉變。隨著現代性的推進，社會分化出不同利益群體，也形成了代表不同群體利益的政治主張及意識形態話語。這些不同主張和意識形態話語之間的競爭，構成了現代性進程中的特有景觀，也導致了現代性的不同方向。

3.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現代社會轉型的兩個最主要的主張和方案。它們之間經歷了一個由最初的對抗和衝突，到彼此承認和接受，再到對話和相互借鑒這樣一種轉變過程。現代化不是一個單純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過程。



4. 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即是一個從傳統向現代、從現代向更加現代的社會轉變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的自我改革和完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會引進和吸收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但並非是完全轉向資本主義社會。

四 “第二次大轉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轉型過程的解釋

除了被鄭杭生教授稱為“狹義轉型論”的“市場轉型理論”和鄭杭生教授倡導的“廣義轉型論”之外，在近年的中國社會學界也有一定影響的另一種有關社會轉型的理論是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 (A. Burawoy) 從所謂“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Sociological Marxism)”立場出發對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轉型所做的闡釋。

在美國學界，塞勒尼等人的“市場轉型理論”研究對布洛維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推動布洛維去關注社會主義國家裏已經或正在發生的變革。但與塞勒尼等人不同，布洛維倡導從一種被他稱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來理解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

那麼，什麼是布洛維所謂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參考布洛維等人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以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矛盾再生產的理論為出發點，以“階級關係的社會再生產”為核心主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它原本致力於探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的穩定是通過什麼樣的一些制度安排實現的，這些制度安排又是怎樣逐漸失效的，由於制度失效而引發的制度危機又是怎樣通過制度方面的創新而被克服的，等等這樣一些問題。



在對這樣一些問題進行探討的過程中，“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否定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以下一些基本命題：

1. 生產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及其所引發的經濟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具有不可持續性；
2. 隨著資本主義可持續性的下降，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必將激化；
3. 這種激化的階級鬥爭，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等等。

按照布洛維的論述，“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是一種既獨立於“國家”又獨立於“市場”的“社會”（“公民社會”/“能動社會”）。它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滅亡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內部產生了一個“社會”，正是“社會”的形成協調了資本主義的國家和經濟，抑制和穩定了階級關係。

因此，“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動態特徵主要是由為穩定階級關係的社會再生產而形成的那些制度安排的不斷革新所造成的。但這些革新所帶來的結果是不確定的：它們既不一定能最有效地穩定階級關係，但也不一定會因為沒有找到最優制度安排而導致資本主義解體。因此，“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否定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

不過，儘管如此，“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者對剝削現象的批判，堅持把消滅了剝削現象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的理想。只不過這種“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是馬克思曾經構想的、或者現實中曾經存在過的那樣一種“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一些可以用來替代資本主義的“真實的烏托邦”。它的基本理念是平等、民主和人道，基本原則是讓“市場”服從於“社會”。



像塞勒尼等人一樣，布洛維也接續卡爾-波蘭尼的觀點，針對原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轉型”的說法，用來指稱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東中歐和東亞各社會主義國家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並就此提出社會學面臨的新任務。

以差不多與塞勒尼等人類似的口吻，布洛維問道：“如果說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的古典社會學致力於解釋朝向市場經濟的第一次‘大轉變’的話，那麼我們應當如何使社會學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轉變’的挑戰呢？”¹⁶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如何以社會學方式來把握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的“第二次大轉型”），仿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做的分析，布洛維提出了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三個命題：

1. 國家社會主義的不可持續性；
2. 反社會主義挑戰的加劇；
3. 朝向替代社會——如某種形式資本主義的轉變。

布洛維認爲，如果在國家社會主義條件下也產生出了某種形式的“社會”，那麼，“國家社會主義”可能不會像今天這樣崩潰，而是會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資本主義那樣具有彈性。“轉向資本主義”不會成爲必然的現實，而是有可能不斷轉向某種替代形式的社會主義，如“民主社會主義”。¹⁷

布洛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學者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將布洛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引進和應用於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研究方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沈原教授是一個主要的人物。在《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等文章中，沈原致力於從“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來理解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

沈原認爲：“兩次‘大轉變’的觀點，爲我們觀察和研究當今中國社會提供了基本視角。簡言之，如果要從宏觀水準和基



本性質上界定當今中國的基本特點，那就應簡明扼要地指出：中國社會正處在兩次‘大轉變’的交匯點上。一方面，從全球化的背景來看，中國社會正處在世界範圍內的市場化潮流，她已經被深深地捲入全球化的漩渦。在中國人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深刻地與世界資本主義的主流文明纏繞在一起，密不可分並受到這種主流文明的制約和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本身也正在經歷劇烈的體制轉型，在國家權力的導引和推動下湧動的市場化大潮，空前猛烈地衝擊著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各個領域，徹底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面貌，重新塑造著全部社會生活。”¹⁸

然而，沈原指出，至少在目前，社會學關於“第二次大轉型”的探討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是塞勒尼等人的“新古典社會學”，二是布洛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沈原認為，後一條研究路線比前一條研究路線更為可取。

沈原認為，塞勒尼等人倡導的“新古典社會學”有以下幾方面的缺陷：

1. 否認“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

沈原在討論“新古典社會學”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時說：“前者對正在來臨的市場社會抱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根本就是走了一條彎路，人類社會最終還是要走向資本主義；後者對市場社會乃至整個資本主義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其基本立場仍然是試圖超越資本主義。”¹⁹

2. 忽略工人階級在轉型進程中的歷史作用

沈原說：面對“第二次大轉變”，“新古典社會學”秉承韋伯傳統，明確地提出了“轉型問題”，即“依靠哪個社會群體，才能完成在計畫體制的廢墟上重建市場社會”的任務。由於“第二次大轉變”的歷史起點與“第一次大轉變”完全不同，是在消滅了私有財產、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社會條件下重新轉向市



場社會的，因此提出產業資產階級的替代問題是必然的。按照塞勒尼等人的觀點，掌握“文化資本”的知識精英是“第二次大轉型”中對產業資產階級的有效替代。但是，沈原認為，“‘新古典社會學’可以說是正確地提出了問題，但卻只是給出了片面的答案。”因為這種答案完全忽略了工人階級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面對第一次市場轉型，波蘭尼提出了“保衛社會”的口號，以抵禦來自市場的對“社會”的侵襲。但沈原認為，這一口號在“第二次市場轉型”進程中並不完全適用。因為前一口號的前提是已經有一個需要我們去保衛的“社會”存在。但在“第二次市場轉型”國家中，由於“經歷了再分配經濟和與之匹配的極權體制的長期支配，自組織的社會生活機制不說被徹底消滅，至少也是受到極大壓抑。”面對這種條件，人們必須重建或生產一個社會。“我們必須先有一個社會，然後才能夠保衛它。”

沈原說：在“第一次大轉型”過程中，人們的任務是“保衛社會”，而在“第二次大轉型”進程中，人們的任務則是要重建或生產“社會”。這是兩種不同的認知邏輯和實作邏輯。

參考波蘭尼和葛蘭西 (A. Gramsci) 的看法，沈原認為，在“第二次大轉型”進程中，我們要重建的“社會”，一方面是一種“能動社會 (active society)”，以抵禦或規制市場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以抵禦或規制國家對社會的不良作用。因此，這種“社會”要在與市場和國家的雙重搏鬥中得到界定和維持。但在這兩方面中，“公民社會”的建設具有更為根本的重要性。因為它是重建“能動社會”的前提。

沈原說：“只有當人們透過自己的社會行動，使市場和國家全都匍匐於腳下，臣服於社會本身之際——只有到了那個時候，社會才能夠通過其理論表達即社會學，在自己的旗幟上書寫上



‘社會主義’的字樣。社會至上即社會對市場和國家的支配，正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²⁰

五 鄭杭生等人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與“新古典社會學”的命運一樣，布洛維和沈原倡導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也受到了鄭杭生教授等人的批評。鄭杭生將布洛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歸結為“新布達佩斯學派”的一支。

鄭杭生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對立

鄭杭生教授認為：“按照布洛維的描述，馬克思主義是對市場化趨勢給予否定型回應的產物，社會主義是與市場經濟截然對立的過程，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解釋為絕對否定和拒斥市場經濟的。這樣一來，我們的選擇的只能是：要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要麼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按照這種絕對排斥的二分邏輯，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著不同的經濟成分，實行了市場化經濟以及相應的生產、管理、組織技術，就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因而就要‘超越資本主義’。”

“表面上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與‘新古典社會學’不同，一個倡導研究資本主義新類型，另一個要以馬克思主義超越資本主義。但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都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只能是一個向度，即向資本主義轉變。不過，它們提問的方式、分析路徑的確各有特點：‘新古典社會學’是以正題的形式提出問題，直接從資本主義新類型以及比較資本主義的角度對



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進行研究；‘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則是以反題的形式作為鋪墊，從批判和否定經濟市場化以及資本主義的角度曲折地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進行資本主義的論證，從而推演出超越資本主義的邏輯。因此，這兩種論點可以說形相異而質相同，路徑有別而結論一致。”

“但是，‘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及其超越資本主義論有著更大的迷惑力。因為，它披掛著馬克思主義信徒的飾物，以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識來遮掩對當代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的排斥；它將社會主義的舊觀念奉為至尊信條，拒絕社會主義不斷自我更新和完善的事實；它固守片面的、僵化的、早已被拋棄了的社會主義舊模式，否定正在成長的新型社會主義的實踐。

不僅如此，它借用社會學對弱勢群體的關切、對市場經濟化過程社會公正的強力呼籲，把進步過程必然發生的代價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以此作為進行社會動員的理由，力圖打造出一個反制度的階級或群體（往往以‘工人階級’來混淆視聽），甚至不惜撒播、推動、激化社會不和諧因素，背離了社會學‘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深層理念。我們可以又一次體會到‘新古典社會學’及其比較資本主義研究論與‘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及其超越資本主義論的‘兩極相通’——如果說前者是要‘打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那麼後者是想‘打造沒有資本家的工人階級’。”²¹

2. “公民社會是一個陷阱”

鄭杭生教授還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關於重建“公民社會”的主張進行了批評。

鄭杭生明確提出：“西方式‘公民社會’不能是我們社會建設的目標。”“我們不能把對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探索創新納入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框架，不能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理论框架中跳舞。一些人把西方公民社會描述得非常完美、美妙。這



不符合事實。以至於學者王紹光寫文章提出要對‘公民社會’祛魅。西方的公民社會理論，是要培育發展一個在‘公民社會’名義下與政府抗爭的對立的社會，並把黨委領導驅逐出社區，把執政黨對社會、社區的領導稱之為一黨獨裁。這是最大的陷阱。一定要警惕和看清這一邏輯。”

鄭杭生教授評論說：“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把社會與市場、國家截然對立起來，提出所謂‘公共社會學拒絕與市場和國家的共謀’。這種主張，通俗地說，就是讓國家（政府）走開，也讓市場走開，剩下他那個其作用被誇大的‘社會’，即他的‘公民社會’、‘能動社會’。按照這種理論，那麼行動的選擇只能是：要麼為市場化張目、為國家立言、對社會侵奪，要麼成為創立社會、保衛社會、解放社會的鬥士。這樣，一個獨立於國家並具有抗爭和制衡力量的社會，完全能夠自主、自治、能動的社會，是解決現代社會一切問題的一劑良藥。這種主張很激進，但是根本做不到的。‘社會’無時無刻不是在處理與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實際運行著。上述觀點根本不適合中國的社會建設和社區建設。因為它在中國社會毫無根基，既沒有歷史的根基，也沒有現實的根基。在中國社會，這種觀點不能不是一種‘無根的觀點’。”

不過，為了避免誤解，鄭杭生教授對此做進一步的解釋說：“我們的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探索創新，以我為主，有我們自己理念、思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只是不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中跳舞。識破西方‘公民社會的陷阱’，跳出西方理論框架，是為了更好進行社會建設、社會管理，而不是要放慢社會建設的步伐，該發展社會組織還是要發展，該購買服務還是要積極購買，政府該依法行政還是要依法行政，基層黨組織、黨員個人的作用該加強的還是要加強。”²²



六 總結和評論

總結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前的中國社會學界，針對中國當前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過程，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理解或詮釋：一是塞勒尼、孫立平等人所倡導的“市場轉型理論”或“新古典社會學”，布洛維、沈原等人所倡導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三是鄭杭生、楊敏等人所倡導的“廣義轉型論”。在這三種不同理解的贊同者之間所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是：“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走向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塞勒尼、孫立平等“市場轉型理論家”或“新古典社會學家”和布洛維、沈原等“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走向是從傳統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走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塞勒尼、孫立平等“市場轉型理論家”或“新古典社會學家”對這一走向基本上持一種肯定的態度，而布洛維、沈原等“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者”則對這一走向持一種基本否定的態度。以鄭杭生、楊敏等“廣義轉型論者”則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走向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社會走向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

那麼，我們該怎樣來看待和評價這三種不同理論立場在上述問題上的分歧和對立呢？在本文剩下的部分，我們擬就這個問題來做一個簡要的討論。

其實，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不僅存在於學者們當中，而且也廣泛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世界裏的各色人等之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儘管中國大陸官方文獻始終堅持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一種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過程，是從一種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轉變，但民間人士（既包括普通民眾也包括學者等）則多數



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²³不過，仔細地考察一下爭論雙方的論述，我們就會發現，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所出現的分歧，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爭論各方對“社會主義社會”一詞所做的模糊而又不同的理解或界定。

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官方文獻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界定一般可以概括如下：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成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與其同盟軍貧下中農一道）通過其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對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進行共同佔有、實行有計劃的統一管理、並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對勞動產品進行分配。具體而言，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內容：

1.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包括：

- (1)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具體表現為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
- (2) 政府對生產過程實行指令性的計畫調節；
- (3) 以“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產品分配制度（具體包括實物分配和商品分配兩種不同形式）。

2. 社會主義的政治與法律上層建築。包括：

- (1) 工人階級在法理上成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與其同盟軍——貧農、下中農一道對整個社會進行統治或管理；
- (2) 工人階級與其同盟軍的這種統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其成員在國家以及企事業單位管理中的一些法定權利（不能解雇、直接或間接參與企事業單位的管理等）體現出來；



- (3) 在更多的情況下，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統治地位是通過其“先鋒隊”即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或其他名稱）對社會實行的“一元化”領導來加以實現。
3.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觀念上層建築。包括：
- (1)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思想領域的絕對指導地位；
 - (2) 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念（如“集體主義”、“大公無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地位。
- 等等。

可以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運動基本完成之後至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基本上是符合上述特徵的。然而，改革開放之後，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中國社會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在社會的“經濟基礎”方面，以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定義中的三個方面基本上都被徹底改變。今天的中國社會，其“經濟基礎”表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徵：

- (1)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已經讓位於多元化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既存在著國家所有制，也存在著私有制等其他所有制。而且，在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私營企業已經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 (2) 政府對生產過程的指令性計劃調節已經讓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通常採用的那種凱恩斯主義性質的、以財政—貨幣手段來進行的宏觀調節；
- (3) 以“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產品分配制度已經讓位於西方經濟學家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原則來進行的分配制度。

至少從形式上看，今天中國的經濟形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形態已經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與此相應，工人階級在國



家和所在單位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地位也大幅下降，原有的許多法定權利（不能解雇、直接或間接參與企事業單位的管理等）也差不多喪失殆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還能夠宣稱中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呢？正是從這樣一種質疑出發，許多人（包括了學者——其中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有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包括許多普通民眾）才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當然，由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更多的只是在經濟形態方面類同於“資本主義”社會，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方面還與通常我們看到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同，因此，人們往往想到在“資本主義”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詞，將當前的中國社會稱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並以此為據，將當前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理解為一個從“社會主義”向“（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

然而，或許是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一種質疑，為了能夠在改革開放的上述預期結果出現之後繼續維護“中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宣稱，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對“社會主義”的含義做了一個重大的修正。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就是共同富裕”這樣一個新的定義。按照這一定義，“社會主義”的實質內涵或根本目標就是“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所謂公有制/私有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按勞分配/按要素分配等都不過是一些發展經濟或生產力的制度工具或手段。對於這些工具或手段，“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加以利用，“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加以利用。只不過前者在利用這些手段發展了生產力後，並不能做到讓全體社會成員來共用發展的成果以實現“共同富裕”，而後者則能夠做到，因為後者是由代表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利益的政黨——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以馬克思主義為絕對指導思想的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絕對領導地位確保了經濟發展的成果最終將能夠為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共享以實現“共



同富裕”這樣一個理想。因此，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應該是去看它是否還是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而是要看它最終是否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理想目標。當然，在經濟增長還沒有達到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水準（“共同富裕”意味著至少讓每個社會成員都能享有同一時期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生活水準，否則就只能“共同貧窮”）。而“共同貧窮”的社會，按照新定義，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社會”，即使它實行了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符合“公平”、“公正”、“平等”一類的原則）之前，可能會要經過一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為了提升經濟效率，刺激經濟增長，還有必要在收入或財產分配方面維持一定差距或不平等。但維持這種差距或不平等的目的正是為了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富裕”。因此，不能因為這一階段上還存在著這種差距或不平等就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在這一階段上，該社會依然可以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標誌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以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絕對主導地位。因為，按照前面的分析，正是後兩方面因素的存在確保了這個社會在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必將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標。假如由鄧小平開啟的這樣一種“社會主義”解釋可以被接受，那麼，的確，宣稱當前的中國社會還是一種“社會主義社會”也就自有其理論根據。²⁴

由上可見，在當前中國，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概念，至少是有以上這麼兩種不同的界定。這兩種不同的界定自然決定了對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兩種不同理解：一個人（譬如塞勒尼、布洛維、沈原、林南等）如果接受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種界定，他就必然會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從“社會主義”轉向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反，一個人（譬如鄭杭生等）如果接受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第



二種界定，他也就必然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從一種傳統的“社會主義”向一種“新社會主義”轉變。而在對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所做的這兩種理解當中，哪一種更為合理，則即完全取決於對“在上述對‘社會主義社會’概念所做的兩種界定當中，哪一種更為合理”這個問題所做的回答。如果我們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確定的回答，我們也就可能對上述有關中國社會轉型的兩種理解的合理性作出明確的判斷；反之，我們也就只能將它們做等量齊觀。²⁵

注釋

- 1 本文系以作者于2012年1月在法國里昂大學社會學系所做同題演講稿為基礎修訂而成。
- 2 伊亞爾、塞勒尼、湯斯利：《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鬥爭》中文版序，呂鵬、呂佳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3 伊亞爾、塞勒尼、湯斯利：《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鬥爭》，第3頁。
- 4 孫立平：“從‘市場轉型理論’到關於不平等的制度主義理論”，《中國書評》，1995年第4、5期。
- 5 孫立平：“社會主義研究中的範式及其轉變”，《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5期。
- 6 孫立平：“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
- 7 邊燕傑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02。
- 8 伊亞爾、塞勒尼、湯斯利：《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鬥爭》。
- 9 塞勒尼等：《新古典社會學想像力》，呂鵬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10 孫立平：“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見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12-413頁。
- 11 孫立平：“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見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第412-413頁。



- 12 孫立平：“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見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第413頁。
- 13 孫立平：“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見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第417頁。
- 14 鄭杭生、楊敏：“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新型社會主義的成長—對新布達佩斯學派中國版的學術剖析”，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29頁。
- 15 鄭杭生、楊敏：“新布達佩斯學派狹義轉型論的重大缺陷”，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下），第937頁。
- 16 Burawoy, “The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
- 17 布洛維：“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公共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174-175頁。
- 18 沈原：“社會轉型和工人階級的再形成”，《市場、階級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70-171頁。
- 19 沈原：“社會轉型和工人階級的再形成”，《市場、階級與社會》，2007年，第172頁。
- 20 沈原：“社會的生產”，《市場、階級與社會》，2007年，第299頁。
- 21 鄭杭生、楊敏：“新布達佩斯學派狹義轉型論的重大理論缺陷——一種社會學的學術視野”，載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下卷），第946-947頁。
- 22 鄭杭生：“中國社會學不應在西方的籠子裏跳舞”，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news/403770.htm>
- 23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位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來到北京大學訪問，談起對中國的觀感，直認當時的中國比美國還要更像“資本主義”社會。
- 24 按照這樣一種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解，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眾多“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也已經是具有了較多“社會主義”色彩的“資本主義社會”，而非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今天的眾多資本主義社會也都借助於“福利國家”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標。
- 25 除了“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走向是什麼”這個問題之外，在上述三種當前中國社會轉型解釋框架之間還隱含著其他一些爭議之點，譬如“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走向應該是什麼”等。限於篇幅等原因，本文未加討論。

